

# 用摄影机战斗，留下气壮山河的珍贵影像

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摄影师、九旬老人黄宝善回忆峥嵘岁月

本报记者强晓玲、张博令

“早晨我们还一起在砾沼河畔洗漱、玩笑，下午人就没了。”

翻看着手里泛黄的黑白照片，黄宝善老人陷入了沉思。

那是1952年的秋天，砾沼河水已经有了些许凉意，照片中的几个小伙子蹲在河边洗个脸，在战火中的朝鲜，享受片刻的宁静。

砾沼河又叫罗盛教河，山脚下的河面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罗盛教把朝鲜少年从冰窟窿里救上来的地方。彼时，抗美援朝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停战谈判又陷入僵局，战争还要继续。

这些小伙子是第二届赴朝鲜慰问团摄制组成员，都来自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此刻他们刚刚经过一夜行军，赶到这个叫做石田里的地方。

照片中，蹲在河边刷牙的高庆生看上去那么年轻，不远处，黄宝善悄悄拍下了这张照片……然而，几个小时后，高庆生便在突如其来空袭中牺牲，身旁是他负责的那台苏联艾姆摄影机。

“摄影机就是我们的枪，人在枪在。这是当年电影训练班的第一课。”当时只有20岁的黄宝善经历了同伴牺牲的全过程，这名两次进入朝鲜战场担任摄制组副务，参与纪录片《钢铁运输线》，故事片《长空比翼》等多部抗美援朝题材作品，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史料镜头，如今已经90岁的黄宝善老人喃喃地说道，“如果活到今天，高庆生应该93岁了吧！”

**《钢铁运输线》是一部影片，更是一个摄制组**

“岁月悠悠一瞬驰，长记钢铁战线时。  
二十六人摄制组，建厂出征第一支。  
胸怀保家卫国志，肩负记录英雄诗。  
五十八年逝去矣，昔日青年鬓发稀。  
……”

2010年，“抗美援朝胜利60周年”给了淬炼于战火的那群热血青年再聚首的理由，然而，看着身边“硕果仅存”的几人时，黄宝善兴奋又伤感，于是作长诗“忆《钢铁运输线》”以纪念。

“‘钢铁运输线’是在朝鲜战场上出现的一个词语，把运输线这一普通的名词，冠以‘钢铁’二字，形象、生动、高度评价了志愿军广大指战员，在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支援下，为保证前线部队军事物资供应，为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用激情、智慧、用血肉，用无数人的生命所建立起来的‘打不烂，炸不断’的后勤供应链。

《钢铁运输线》是一部影片，更是一个摄制组，对于我们这些曾经参加的成员来说，是一个生死与共的战斗集体，是我们永生难忘的记忆，是共同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

在当年的回忆中，黄宝善这样写道，“那时，我们正年轻，全组26个人，平均年龄25岁，23岁以下的有13人，占全组半数。导演冯毅夫同志33岁，最年长的薛伯青同志43岁，最年轻的陈毓中和沈友春只有18岁。岁月如梭，从1953年1月摄制组入朝到现在，其中多数成员已经离我们而去，在世的也没有几个了。”

1952年8月，八一电影制片厂初建，9月份适逢中国第二届赴朝慰问团赴朝慰问，八一厂奉命组成摄制组拍摄纪录片。按照计划完成两部影片，一部是拍摄战地慰问活动的《慰问最可爱的人民》，夏侯瑛任导演，随慰问团总团活动的摄制组成员包括高庆生与黄宝善等六人。

另一个任务则是拍摄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队为保证前线军队物资供应，战斗在运输线上的英雄事迹影片。就在慰问团抵达朝鲜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司令员洪学智在志愿军后勤部队驻地香枫山接见了冯毅夫导演，冯毅夫接触到大量英雄事迹和一手资料。

期间适逢上甘岭战斗正酣，摄影师谢祀宗和应迪二人还曾到上甘岭前线采访。

10月17日，慰问团总团抵达朝鲜平安北道成川郡石田里进行慰问，摄制组拍摄了慰问团和朝鲜群众祭奠罗盛教烈士的隆重场面。

“赴朝前，我们都接受过防空训练，敌机轰炸时，如在屋内，应就近在窗下躲避。”几天的适应，黄宝善知道，敌军的轰炸往往一波接着一波。

随着轰鸣声远去，他和身旁的陈毓中迅速收拾设备，“当年的摄影机是绝对的宝贝，摄影组仅有两台，坐车的时候稍微有点颠簸，大家都是抱一抱。”

这时，高庆生跑了进来，黄宝善顺手把他负责的摄影机递了过去，“他气喘吁吁，脸涨得通红，还淌着汗。”高庆生背起摄影机转身出了门，黄宝善与陈毓中紧跟其后。在一处民房的院落里，一直奔跑的黄宝善看到一名朝鲜妇女隐蔽在几棵玉米秆下，紧紧地趴在地上，便条件反射般地紧急卧倒，之前的防空训练让他本能地张大了嘴巴，“以免爆炸造成耳膜穿孔”。

“飞机炸弹的声音就像是大块钢板断裂发出的，‘咔嚓’一声巨响。”炸弹落在了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黄宝善仿佛被人抓住胳膊，拎起了腿，又重重地摔在地上，满嘴沙土，耳朵里什么都不听见了。

正是这次轰炸夺去了高庆生年仅25岁的生命。

人们把他的遗体安葬在罗盛教烈士的墓地旁边，写下了“魂永伴罗盛教，烈魄常依砾沼河”的挽联。后来，那台被他抢救出来的摄影机被命名为“光荣号”，如今还陈列在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厂史馆里。

“想通过一次随慰问团的短暂活动，就拍成一



▲《钢铁运输线》摄制组全体合影。组图均由受访者提供



▲《钢铁运输线》新闻照片。



▲1952年10月17日晨，高庆生烈士（右一）在石田里砾沼河河边洗漱。几个小时后，高庆生便在突如其来空袭中牺牲。

## “大家是凭着一种信念在战斗”

在纪录片《钢铁运输线》中有这样一组镜头：

在朝鲜战场，如蝗虫般的敌机轰鸣着黑压压地掠过，不时投下炸弹。志愿军车队在树枝柴草的掩护下或躲进路边掩体，或加速通过，更有中弹停火的车辆，和奋力扑救的战士……

就这样，大家的拍摄持续到四月，停战谈判重启，摄制组的重心开始放在铁路、公路运输线的拍摄上，但联合国军的密集挑衅仍在继续。期间最惊险的无疑是五十军军部被炸，而“国宝级”摄影师薛伯青死里逃生。

一天，正在西海指战道里的黄宝善，接到史文帜导演的电话：“正在五十军工作的薛伯青一组遭遇敌机轰炸。”这一消息让大家感到震惊，电话里，史导演难过地念叨着，“出这么大的事，他一家大可怎么办！”

为了弄清情况，黄宝善赶紧到政治部秘书科去询问，对方答复：“报上来的情况没有涉及电影厂的同志。”因为没有具体反馈，摄制组成员四下打听，“几天后，大家正在驻地休整，老薛、张伦、戴赤三人风尘仆仆地推门而入，带给了大家一片惊喜，一阵欢呼。”

原来出事当天，正在五十军军部的薛伯青组计划去清川江拍摄部队施工。由于车辆调度，需要等到第二天才能成行。晚饭后，他们在驻地散步时，遇见了军参谋长正准备坐车出门，薛伯青便走上去打招呼，得知他要去清川江，而车上只有他一人时，薛伯青提出搭乘参谋长的车一同前往，对方欣然同意。“就这样，三人逃过午夜敌机轰炸的一劫，否则不堪设想了，因为他们的住处正是轰炸中心。”

说起摄影师薛伯青，黄宝善满眼敬意，“薛老师是中国电影界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经历了从上海最早的电影《夜半歌声》等，从摄影机的动力由手摇到电动，胶片由黑白到彩色，由16mm到35mm再到宽银幕的发展，他就是中国一部电影史。”

朝鲜战场的每一天，除了惊险更多是友情。

黄宝善记得，在清川江口拍摄部队修筑工事时，他们遇到敌机轰炸，有一位同志的腹部受伤，当时人们四散隐蔽，只有摄制组的张伦一个人在他身边，冒着敌机连续的轰炸扫射，用急救包为他进行了包扎。

时值冬末初春，朝鲜的天气依旧十分寒冷，摄影队顶着朝鲜北部严寒，冒着敌机的轰炸，分别奔往各地各部，拍摄了抢修公路大桥、清川江铁路大桥等珍贵史料。镜头里，在刺骨的江水中，有凿冰挖洞架设木桥基的工程兵。马息岭上，有穿行在风雪弥漫中的汽车运输队。有抢修公路的朝鲜人民，还有日夜奋战修筑地下坑道的野战部队，在预计敌人可能登陆地点加固防御工事。

“当时，朝鲜的铁路设施几乎全部遭到破坏，火车加水都要靠朝鲜老乡肩背头顶。”黄宝善说。

在朝鲜，摄制组没有具体任务时，大家就会把摄影机器放在身前，躲在隐蔽的地方蹲守，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拍摄，也摸清了敌机飞行轰炸的规律。

“一次，我们就躺在地上，看着敌机从100公尺的高度飞过，那时脑子是很清楚的，知道飞机投弹是90度角，它要是在你脑袋上投弹，炸弹一

般炸不着你。但如果他在你脑袋上用机枪扫射，我们便正在枪口之下。”黄宝善记得，飞行员朝下望望，并没有扫射，只是扔下了两枚炸弹，轰轰的爆炸声离他并不远，然后便飞走了，“这些是战争的常态，已经适应了。”

就这样，大家的拍摄持续到四月，停战谈判重启，摄制组的重心开始放在铁路、公路运输线的拍摄上，但联合国军的密集挑衅仍在继续。期间最惊险的无疑是五十军军部被炸，而“国宝级”摄影师薛伯青死里逃生。

一天，正在西海指战道里的黄宝善，接到史文帜导演的电话：“正在五十军工作的薛伯青一组遭遇敌机轰炸。”这一消息让大家感到震惊，电话里，史导演难过地念叨着，“出这么大的事，他一家大可怎么办！”

为了弄清情况，黄宝善赶紧到政治部秘书科去询问，对方答复：“报上来的情况没有涉及电影厂的同志。”因为没有具体反馈，摄制组成员四下打听，“几天后，大家正在驻地休整，老薛、张伦、戴赤三人风尘仆仆地推门而入，带给了大家一片惊喜，一阵欢呼。”

原来出事当天，正在五十军军部的薛伯青组计划去清川江拍摄部队施工。由于车辆调度，需要等到第二天才能成行。晚饭后，他们在驻地散步时，遇见了军参谋长正准备坐车出门，薛伯青便走上去打招呼，得知他要去清川江，而车上只有他一人时，薛伯青提出搭乘参谋长的车一同前往，对方欣然同意。“就这样，三人逃过午夜敌机轰炸的一劫，否则不堪设想了，因为他们的住处正是轰炸中心。”

说起摄影师薛伯青，黄宝善满眼敬意，“薛老师是中国电影界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经历了从上海最早的电影《夜半歌声》等，从摄影机的动力由手摇到电动，胶片由黑白到彩色，由16mm到35mm再到宽银幕的发展，他就是中国一部电影史。”

朝鲜战场的每一天，除了惊险更多是友情。

黄宝善记得，在清川江口拍摄部队修筑工事时，他们遇到敌机轰炸，有一位同志的腹部受伤，当时人们四散隐蔽，只有摄制组的张伦一个人在他身边，冒着敌机连续的轰炸扫射，用急救包为他进行了包扎。

时值冬末初春，朝鲜的天气依旧十分寒冷，摄影队顶着朝鲜北部严寒，冒着敌机的轰炸，分别奔往各地各部，拍摄了抢修公路大桥、清川江铁路大桥等珍贵史料。镜头里，在刺骨的江水中，有凿冰挖洞架设木桥基的工程兵。马息岭上，有穿行在风雪弥漫中的汽车运输队。有抢修公路的朝鲜人民，还有日夜奋战修筑地下坑道的野战部队，在预计敌人可能登陆地点加固防御工事。

“当时，朝鲜的铁路设施几乎全部遭到破坏，火车加水都要靠朝鲜老乡肩背头顶。”黄宝善说。

在朝鲜，摄制组没有具体任务时，大家就会把摄影机器放在身前，躲在隐蔽的地方蹲守，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拍摄，也摸清了敌机飞行轰炸的规律。

“一次，我们就躺在地上，看着敌机从100公尺的高度飞过，那时脑子是很清楚的，知道飞机投弹是90度角，它要是在你脑袋上投弹，炸弹一

般炸不着你。但如果他在你脑袋上用机枪扫射，我们便正在枪口之下。”黄宝善记得，飞行员朝下望望，并没有扫射，只是扔下了两枚炸弹，轰轰的爆炸声离他并不远，然后便飞走了，“这些是战争的常态，已经适应了。”

就这样，大家的拍摄持续到四月，停战谈判重启，摄制组的重心开始放在铁路、公路运输线的拍摄上，但联合国军的密集挑衅仍在继续。期间最惊险的无疑是五十军军部被炸，而“国宝级”摄影师薛伯青死里逃生。

一天，正在西海指战道里的黄宝善，接到史文帜导演的电话：“正在五十军工作的薛伯青一组遭遇敌机轰炸。”这一消息让大家感到震惊，电话里，史导演难过地念叨着，“出这么大的事，他一家大可怎么办！”

为了弄清情况，黄宝善赶紧到政治部秘书科去询问，对方答复：“报上来的情况没有涉及电影厂的同志。”因为没有具体反馈，摄制组成员四下打听，“几天后，大家正在驻地休整，老薛、张伦、戴赤三人风尘仆仆地推门而入，带给了大家一片惊喜，一阵欢呼。”

原来出事当天，正在五十军军部的薛伯青组计划去清川江拍摄部队施工。由于车辆调度，需要等到第二天才能成行。晚饭后，他们在驻地散步时，遇见了军参谋长正准备坐车出门，薛伯青便走上去打招呼，得知他要去清川江，而车上只有他一人时，薛伯青提出搭乘参谋长的车一同前往，对方欣然同意。“就这样，三人逃过午夜敌机轰炸的一劫，否则不堪设想了，因为他们的住处正是轰炸中心。”

说起摄影师薛伯青，黄宝善满眼敬意，“薛老师是中国电影界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经历了从上海最早的电影《夜半歌声》等，从摄影机的动力由手摇到电动，胶片由黑白到彩色，由16mm到35mm再到宽银幕的发展，他就是中国一部电影史。”

朝鲜战场的每一天，除了惊险更多是友情。

黄宝善记得，在清川江口拍摄部队修筑工事时，他们遇到敌机轰炸，有一位同志的腹部受伤，当时人们四散隐蔽，只有摄制组的张伦一个人在他身边，冒着敌机连续的轰炸扫射，用急救包为他进行了包扎。

时值冬末初春，朝鲜的天气依旧十分寒冷，摄影队顶着朝鲜北部严寒，冒着敌机的轰炸，分别奔往各地各部，拍摄了抢修公路大桥、清川江铁路大桥等珍贵史料。镜头里，在刺骨的江水中，有凿冰挖洞架设木桥基的工程兵。马息岭上，有穿行在风雪弥漫中的汽车运输队。有抢修公路的朝鲜人民，还有日夜奋战修筑地下坑道的野战部队，在预计敌人可能登陆地点加固防御工事。

“当时，朝鲜的铁路设施几乎全部遭到破坏，火车加水都要靠朝鲜老乡肩背头顶。”黄宝善说。

在朝鲜，摄制组没有具体任务时，大家就会把摄影机器放在身前，躲在隐蔽的地方蹲守，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拍摄，也摸清了敌机飞行轰炸的规律。

“一次，我们就躺在地上，看着敌机从100公尺的高度飞过，那时脑子是很清楚的，知道飞机投弹是90度角，它要是在你脑袋上投弹，炸弹一

般炸不着你。但如果他在你脑袋上用机枪扫射，我们便正在枪口之下。”黄宝善说，“我们根据敌机的起飞地点，算准了敌机续航时间，等到敌机不得不返航时，志愿军战机起飞阻击，此时的敌机已没了底气，在前后夹击下，不敢与志愿军再交火，要是不服从，后面的飞机便会马上歼灭敌机，几个回合下来只得乖乖投降。”

到了“金城反击战”时，后勤工作丝丝入扣，运输队司机一轮物资抵达前线，对接人员接受物资负责装货调配，为汽车检修，“趁着司机小憩，一系列工作流程后，再叫醒司机，继续下一趟运送。”黄宝善说，“战争年代，最缺的就是汽车司机。”

后勤保障的不断完善，使运输线沿途都设有兵站、洞库（物资存放点）。战士们肚子饿了，只要随身带着饭票，沿途兵站都有军备、粮食和食堂解决，战争初期战士们挨冻、饿肚子的现象一去不返。

**“你知道硝烟是什么味道吗？是槐花的味道”**

“你知道硝烟是什么味道吗？是槐花的味道，就是这么真实的不和谐！”黄宝善自问自答道。

“那是5月的一个深夜，我们的卡车沿着林荫公路前行，道旁槐花绽放，醉人的清香扑面而来，就在大家沉浸在一派和平幽静中时，突然防空枪声由近而远，公路上原本一路相随的车灯，刹那间全部熄灭，四野立即恢复到一片黑暗中。”这是黄宝善日记中的一段记录。

“随着空中传来的敌机轰鸣声，以及悬在空中、青白刺眼的照明弹下，敌机没目的的投放着炸弹，随着一声巨响，带着刺鼻的硝烟扩散在空气中，与刚刚幽静的槐花香气混合在了一起，告诉我们，这里是流血的战场。”

黄宝善清晰地记得，在五月中旬的一次反击战中，摄制组跟随部队在北汉江南岸，打算对敌方高地进行反击。在暗淡的天色中，战士们和苏制“喀秋莎”火箭炮在树林中隐蔽起来，伴随着槐花香，摄制组成员调好设备做好拍摄准备。傍晚七点十五分，指挥员一声令下，火箭弹齐刷刷地射向敌方高地，霎时间，炮声震天，火光漫山，我军铁幕上的第一次“喀秋莎”发射就是在这样战斗中拍下的。

看过战争电影的人都知道，开火就意味着行踪暴露，敌军循着弹道很快就能定位发射区域，先开火的一方就需及时转移。几分钟后，敌人的炮弹纷至沓来，我军早已撤到山坡背面隐蔽起来。摄影李尔康组的同志和同在战场采访的新华社记者时盘棋等便在山坡背面有说有笑地忍受了一个小时的“炮毙”，槐树的花香伴着硝烟的味道，涌进了他们的鼻腔，更刻在了他们的记忆里。

从此以后，每年5月甜腻的槐花香气总会让老人们想起战场上的缕缕硝烟。

朝鲜战场的拍摄紧张而忙碌，史文帜导演就在夺下高地的第二天，率领摄制组中的张志辉、张世鸿、沈友春三人，冒着美军高、中、低空数百架次飞机的报复性轰炸，争分夺秒地拍过被我军攻克的高地。画面中敌军尸遍地，工事崩塌，一片狼藉。

尽管摄制组涉险拍下不少珍贵的前线画面，但不少重要战役都是夜间进行，摄影机根本无法捕捉到真实的场景，因此，每场战役后的补拍工作也是这部纪录片的一个特色。